

全球治理倡议的文明基因、历史逻辑 和实践路径^[1]

周意岷 高祖贵

【内容提要】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又一重大公共产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中华文明以“和而不同”“为政以德”“乾坤并建”“民惟邦本”等理念为基因，确立了多元共存的治理原则；新中国在文明基因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从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个方面出发，以实际行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全球治理倡议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是新中国历史与实践经验的汇聚，丰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体系。

【关键词】全球治理倡议 全球治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南方

【作者简介】周意岷，西安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研部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高祖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育长、主讲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6) 01-0001-21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东地区非国家武装组织智能化演进模式及风险防范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5XGJ020）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202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积极响应。该倡议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成为中国提出的第四个全球性倡议,包含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1],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全球治理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不仅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思想特质,而且延续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格局和理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2],着力践行“共商共享共建”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文明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

中华文明秉持“和而不同”“为政以德”“乾坤并建”“民惟邦本”等价值理念,在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基础上,尊重周边政治实体的独立性和差异性,积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树立讲信义、重情义、说到做到的优良形象,确立了中国古代多元共存的治理原则,塑造了全球治理倡议的文明基因。

(一)“和而不同”：强调主体的独立性与差异性共存

“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既是孔子等先贤对人际交往基本原则的论述,也是中国古代对于世界多样性和统一性看法的精练概括。

[1]《新华社权威快报丨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新华网,2025年9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50901/06e5c0eb0bc544929476af7798ee51f5/c.html>。

[2]习近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载《求是》2025年第20期,第10页。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55页。

首先,中国哲学强调“多元中的秩序”,尊重“不同”的自然状态。孟子所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意指客观世界的事物和人各有“不同”。产生“不同”的内在动力则是事物自身及其内部各要素的永恒运动。道家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墨家的“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1],也都是强调“不同”为万事万物的自然状态。因此,先秦诸子百家都承认和接受“不同”的存在,并不主张强行消灭“不同”、强制同化,以免丧失其本性。

其次,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虽然承认和接受“不同”,但却未放任“不同”,而是各自探索实现“和”的路径,以“不同”致“和”。墨家和法家认为“不同”是导致春秋战国时期兵连祸结的根源,因而都主张以强力手段消除“不同”产生的负面影响,塑造秩序和规则。孔子以仁为核心理念,以德限制权力,以礼约束言行,通过引导、塑造和协调“不同”,实现君子之间的“和”,而非以暴力或利益强制求同。在儒家看来,“和”乃“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2]

(二)“为政以德”: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首次提出“为政以德”的理念,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确立“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的施政方针。

一方面,强调以德治国的治理之道。“周公致理,务在安民,正政修德,以庶民为先。”^[3]周公旦以“德治”为出发点,发展出“制礼作乐”“明德慎罚”的政治构想,通过“封邦建国”与“宗法制度”,强化了以宗族为单位的政治网络,从而贯彻“为民所依,赖民所安”的治理理念。管仲将“德治”进一步延伸为“仓廩实而知礼节”,找到了在政治实践中落实“为政以德”理念的抓手,将“安民”“富民”“育民”确定为实现国家富强的的重要手段,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治理。

另一方面,构建“德法共治”的秩序基础。儒家提出“道之以政,齐

[1] 方勇译注:《墨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3页。

[2] 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2页。

[3]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即通过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来治理百姓，使他们内心能够产生羞耻心，从而自觉遵守社会秩序。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独尊儒术”，同时主张“德主刑辅”“刑者德之用也”的理念，确立了“以德为纲、以法为用”的治理模式。^[2]从汉至清，各个朝代都不同程度地融合了“德治”与“法治”，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治理模式。“德治”以“仁政”为核心，强化“以人为本”“天下为公”的治理理念^[3]；“法治”是“德治”的底线保障，提供操作规则、裁量标准，有效弥补“德治”的不足。

（三）“乾坤并建”：构建多元共存的政治共同体

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天下”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和文化概念，孔子据此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不过，儒家中的公羊学派提倡的“王者无外”理念并不是要强行同化各民族和文明，而是强调各民族的普遍平等，只有亲疏，没有内外之别。

一方面，在传统疆域内构建多元一体的政治共同体。汉武帝派遣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日渐频繁的贸易往来加快了文化和人员的交流互通。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和伤寒导致中原地区人口锐减，边疆众多民族内迁，建立多个同时并立的政权。各民族政权都将重建“大一统”作为政治目标，使用华夏的正朔、服饰和礼乐，并以“夷夏共祖”“行夏之正”宣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与合理性。匈奴人刘渊为取得政权合法性，追认先祖为冒顿单于与汉高帝刘邦的宗女之后，以复汉为名，建立汉赵政权；北魏拓跋氏提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4]，追溯黄帝为民族祖先，

[1]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13页。

[2] 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24—330页。

[3] 李建华、李彦彦：《儒家德治思想的现代价值转化》，载《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3期，第127—130页。

[4]（北齐）魏收：《魏书·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页。

建构鲜卑与汉族“同源共祖”的历史叙事,强调以德而非血缘身份衡量正统,初步体现出政治共同体的思维。

另一方面,与周边民族和国家构建多元共存的政治共同体。唐朝时,中国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欢迎万国来朝,来自拜占庭、大食、波斯、新罗、日本的商贾、学者和旅人汇聚于都城长安,中亚地区的众多邦国主动加入唐帝国的势力范围,形成“昭武九姓”。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了“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理念^[1],主张以文化认同作为“天下”的界限,进一步增强了政治共同体的包容性。元代以后,多民族中国大一统的框架逐步固定,中国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基本理顺,多元共存的治理原则走向成熟:在传统疆域内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形成“多元共存”格局。

(四)“民惟邦本”:政治合法性的伦理建构

“民惟邦本”的政治理念源自中国古代典籍《尚书·五子之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达,强调人民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只有民心安定、社会秩序稳固,政权才能长治久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不仅是一句政治训辞,更是一种政治合法性的伦理建构。

一是政治权力的民本正当性。周人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取代殷人,敷有天下,是由于他们拥有天命。《尚书·召诰》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上天哀怜四方百姓,眷顾百姓,因此更改殷命。周人普遍信仰“天”,却并不像商人那样迷信于“天”的眷顾,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2]由此引申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民意成为王朝更替的合法性支撑。

二是社会结构的民本基础。“民惟邦本”在社会结构维度表征为有序且稳固的社会制度。周代的宗法制、井田制、封建制等制度设计,均围绕“使

[1] (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2021年版,第14页。

[2] 黄国辉:《周代民本思想的历史内涵和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4月28日,第6版。

民有恒产”“定居而乐业”展开，目的是构建稳定的基层秩序，以承载国家治理体系。汉代以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不断演化，延伸出爱民、利民、养民、富民等一系列主张，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所重视。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强调人民参与、法治保障与制度正义，其本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以民为本”理念的制度性回应。这种价值承继也证明“民惟邦本”并非陈旧教条，而是具有穿越历史的生命力。

总之，中华文明的独特基因外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观和天下观，为我们正确看待和处理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差异、分歧提供了重要启示，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和方法。

二、历史逻辑：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总结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中国始终坚持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逐步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探索全球治理的理念与框架，在全球治理规则的改革与完善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夯实主权平等的制度基础

1953年，中国在“和而不同”理念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推动其“成为开放包容、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准则”。^[1]1954年，中国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成为印支三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里程碑。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展现了中国尊重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赢得了与会国家的普遍赞同。1960年，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2年，中国促成各方通过《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在历次中东战争期间，中国坚定支持阿拉伯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反对强权势力的侵略扩张和干涉行径。为支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390页。

持非洲独立运动，中国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刚果、坦桑尼亚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与非洲国家形成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与大国、周边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倡导平等、反对霸权的重要支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为引领国际关系发展演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

（二）贯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建立更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近代中国被迫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与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1949年1月，毛主席会见苏联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时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基本外交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将近代以来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全部清除，并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条款，捍卫了主权平等原则，坚决反对外来干涉。

在双边领域，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指导，通过和平谈判与平等协商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边界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国相继与缅甸、尼泊尔、朝鲜、蒙古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1992—2011年，又先后与老挝、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越南6个国家谈判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至此，中国与14个邻国中的12个国家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在坚持“主权属我”前提下，创造性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这既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精神的遵守，也为妥善处理与邻国的海上争议提供了指南。据此，中国同东盟10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

[1] 王巧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9），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版，第82页。

[2] 袁宇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载《人民日报》2024年6月28日，第2版。

海行为准则”磋商，同越南成功划定北部湾海洋界线，等等。^[1] 这些成果都为各国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争端树立了良好范例。

在多边领域，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一道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支持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谴责以色列侵略叙利亚和黎巴嫩、恢复印支三国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陆续加入《特定常规武器公约》（1982年）、《生物武器公约》（1984年）等，为推动国际裁军与军控进行了不懈努力。1988年12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2] 此后，中国支持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等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2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6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6年），积极参与联合国在科教文卫、人权、环境、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的工作，为全球治理倡议积累了法治经验。

（三）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冷战结束后，中国逐步扩大开展多边外交的领域和范围，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等组织和平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启了与东盟合作对话、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2000年10月，江泽民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中非携手合作，共迎新的世纪》的讲话，首次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概念，强调各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协商解决国际问题，联合国、发展中国家及其国际和地区性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应得到加强。^[3] 此后，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更加积极主动，不但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且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并牵头创办博鳌亚洲论坛。这些成就都成为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1] 参见宗海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海外交百年历程》，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13日，第16版。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3] 江泽民：《中非携手合作 共迎新的世纪——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00年11月7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jzg_673183/fzs_673445/dqzzzhjz_673449/zfhzlt_673563/zyjh_673573/200011/t20001107_7618458.shtml。

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国继续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特别是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协作。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系统阐述了“和谐世界”的理念，主张建立一个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包容互鉴的世界，倡导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和睦相处、和谐共生。^[1]2009年，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四国领导人正式启动一个新兴国家多边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外，中国还相继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参与东亚峰会，开启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并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通过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南南合作等方式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四）坚持外交为民，倡导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权

新中国成立不久即开始了对亚非国家的援助，帮助亚非新独立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掠夺。周总理在出席万隆会议时向亚非国家代表提出：“中国愿意在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帮助邻国发展农业、卫生与教育。”^[2]中国在非洲建设的坦赞（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肯尼亚国家体育场等标志性的大型援建项目，向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援助派遣的教师和医疗人员等，均体现了以发展为中心的国际合作理念。

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发展权利宣言》，将发展权列为基本人权。据此，中国提出以发展促和平、以“发展权”为价值导向的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附加政治条件，深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后，中国通过减免债务、建设基础设施、提供教育和培训支持等形式，促进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500亿美元，明确要求将资金优先用于最不发达国家；向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并免除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3]中国还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重视向

[1]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55页。

[2] 《周恩来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3] 胡锦涛：《同心协力 共创未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2009年的60年间,中国累计向161个国家、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2563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减免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380笔,并已承诺对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5%的输华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1]总之,中国对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始终秉持“人民为本、发展为纲”的原则,特别注重通过国际发展合作来增进受助国社会民生和人民的获得感,体现出一脉相承的外交传统。^[2]

（五）坚定履行国际承诺，勇于承担大国责任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注重言必信、行必果,以实际行动勇担大国责任。一方面,积极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稳定,促进共同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保持货币汇率基本稳定,维护了亚太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发展;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不断加强法治体系和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切实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截至2011年,中国同16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经贸合作机制,同129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同96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关税总水平从15.3%降到9.8%。^[3]

另一方面,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应对全球性挑战。在传统安全领域,2003年中国促成六方会谈机制,致力于妥善应对朝核问题和维护朝鲜半岛和平;2006年起开始参与伊朗核问题相关方磋商机制,努力劝和促谈,为促成伊朗核问题协议(又称《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2007年颁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推动绿色发展和节能减排进入国家议程,帮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国家恢复社

[1]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外交部网站,2011年9月6日, 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1nzt_675363/zgdhpfzbps_675409/201109/t20110906_9284881.shtml。

[2] 参见罗建波:《中国与南南合作的当代走向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2期,第69—78页。

[3]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外交部网站,2011年9月6日。

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等，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第一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2008年起参与亚丁湾护航，积极维护重要国际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

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逐步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外交范式，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成长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更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全球治理倡议应运而生积累了经验和做好了理论准备。

三、新时代实践路径：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另一方面，冷战思维、霸权主义、保护主义阴霾不散，新威胁、新挑战有增无减，现行国际机制存在“全球南方”代表性严重不足、权威性遭到侵蚀、有效性亟待提升三大短板。^[1]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将“和而不同”“为政以德”“乾坤并建”“民惟邦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延续并发展了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提出了包含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倡议，以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使之更好地适应多极世界的到来。

（一）奉行主权平等，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国秉持“和而不同”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认同。

[1] 《新华社连发六文，解读全球治理倡议深刻意涵》，新华网，2025年9月18日，<http://www1.xinhuanet.com/politics/20250918/a08931003a0045b08b19229b360cce1b/c.html>。

一是尊重国家主权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寻求势力范围。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尊重沿线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传统文化作为合作前提。2023年2月，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强调“公认的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严格遵守，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切实保障”。^[1]同年11月，中国外交部发布《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强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以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针对2026年1月美国公然军事打击委内瑞拉并掳劫委总统马杜罗夫妇的恶劣行径，中国严正指出美方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支持委方维护自身主权尊严和合法权利。

二是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中国历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例如，中国在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一带一路”共建中，不搞强买强卖，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设价值观门槛^[2]，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合作方式。又如，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减贫、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八大领域，主张要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的需求；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文明优越论”。再如，中国积极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融入全球经济，从2024年12月1日开始，对原产于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的100%税目产品，适用关税税率为零的特惠税率，是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

三是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了打破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

[1]《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外交部网站，2023年2月24日，https://www.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dozys_673577/xwlb_673579/202302/t20230224_11030707.shtml。

[2]《机遇之路 繁荣之路——“一带一路”中的共同发展理念》，新华网，2023年10月12日，http://www.xinhuanet.com/silkroad/2023-10/12/c_1129913203.htm。

格局，中国强调人民是世界发展的主体，主张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此，中国积极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加快份额改革，以反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推动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融资选择，打破西方金融垄断；深化同拥有 130 多个发展中国家成员的 77 国集团的合作，支持举办“77 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共同维护和拓展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积极支持该组织在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二）坚持国际法治，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

中国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理念延伸到国际法治领域，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新时代开启以来，更是积极主动地为建设国际法治、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一是尊重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权威。2012 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等多个场合不断强调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对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反对借国际法之名行破坏国际法治之实，并敦促大国带头恪守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则，履行国际义务，防止世界退回丛林法则。2021 年，中国发布《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重申《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表达了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并将继续做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坚定意志。^[1]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多年来，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参加了 600 多项国际公约及修正案^[2]，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注重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建设国际法治中的话语权。中国支持联合

[1] 参见《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外交部网站，2021 年 10 月 22 日，https://www.fmprc.gov.cn/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1966/zywj_681978/202110/t20211022_10408370.shtml。

[2] 《王毅在联合国安理会“践行多边主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外交部网站，2025 年 2 月 19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zd/202502/t20250219_11558461.shtml。

国在国际立法中发挥主渠道作用，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立法进程。2025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提出了坚持国际法治加强全球治理的六点主张，强调“国际立法必须尊重文明多样性、法系多元性，确保各国平等参与，特别是要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1]；鼓励全球南方国家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积极发声，将公平正义、责任共担等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关心的议题纳入国际立法。截至2025年，中国开展了500余期治国理政专题培训，累计为180多个国家和组织培养了各类人才50多万名^[2]，切实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政府人员参与国际立法的能力和水平。

三是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法治合作。在新兴领域推动建设国际法治方面，中国率先提出共同维护数据主权和个人隐私、反对滥用信息技术干涉他国内政等重要规则；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积极构建全球网络安全协作网络；倡导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搭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平台；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致力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在参与建设国际法治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批缔约方之一，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和实施；截至2025年2月，对外签订6936项双边国际条约、500项多边国际条约，担任13项多边国际条约的保存机关。^[3]在国际执法合作方面，中国与各国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共同应对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截至2022年，公安部与110余个国家建立双边执法合作机制和联络热线，签署政府间、部门间执法合作文件400余份，构筑起国际执法合

[1] 《中方就坚持国际法治加强全球治理提出六点主张》，中国政府网，2025年10月10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0/content_7043754.htm。

[2] 《中国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已为180多个国家和组织培养超50万名人才》，中国政府网，2025年6月27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6/content_7029763.htm。

[3] 参见李林：《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论中国对国际法治进步的贡献》，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第70页。

作网络。^[1]在丰富和发展现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中国于2025年5月牵头发起《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33个国家签署公约成为创始会员国，10月国际调解院在香港正式开业，成员发展到38个国家。这是全球首个专门通过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是国际法治领域的创新之举，也是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创新力”“中国团结力”的新标志。

（三）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协力推动共同发展

针对二战后建立的主要国际机制难以适应国际形势新变化而面临执行困境，中国创造性转化了“乾坤并建”理念，积极参与现有机制的改革创新，倡导建立了一系列新机制和新平台，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用，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提供了机制保障。

一方面，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2015年中国设立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多边合作事业；2022年以来支持联合国在反恐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的中心协调作用；2024年参与联合国未来峰会，推动各方达成“未来契约”，发出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共促和平安全的有力信号。^[2]此外，中国协助联合国建成全球人道主义救援应急中心、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进一步增强联合国主持和参与多边事务的能力。

另一方面，搭建多边平台，协同各方立场、凝聚全球力量。为了共同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风险，中国积极拓展与相关各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共同抵制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团”。在经济领域，中国通过共商共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中亚峰会等机制，深化同相关地区和次区域各国的互联互通；通过实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

[1] 莫纪宏：《推进全球治理需要国际法治保驾护航》，载《民主与法制》2025年第38期，http://e.mzyfz.com/mag/paper_66994_36927.html。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为动荡世界注入宝贵稳定性》，载《求是》2025年第7期，第71—76页。

升级议定书》、加快推进中国—海合会自贸协定谈判、积极争取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等努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在气候变化领域,截至2024年10月,中国累计实施300多期气候变化相关领域或主题的能力建设项目,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1万余人次培训员额^[1];至2025年10月,与43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5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2]在国际反恐领域,中国与阿联酋、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积极开展联合反恐行动与军事演训,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相关培训、装备和技术支持,以能力建设替代以军事干预为主的传统模式,提升对恐怖组织和跨国犯罪网络的识别与追踪能力,共同打击跨境恐怖分子和跨境犯罪活动。

(四) 积极倡导以人为本,实现各国人民共享全球治理成果

全球治理倡议承袭了中国古代“民惟邦本”的理念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立场,强调全球治理的成果应该为各国人民所共享,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一方面,注重共享发展成果和经验,增进全球治理的普惠性。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3]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始终注重让自身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发展机会,帮助其扭转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总体不利地位。截至2025年10月,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拉动约上万亿美元投资,带动4000万人摆脱贫困;通过总额40亿美元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

[1] 参见《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国行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网站,2024年11月15日, <http://www.brigc.net/zcyj/bgxz/2024/202411/P020241115498540252004.pdf>。

[2] 参见和音:《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行稳致远》,载《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3日,第2版。

[3] 《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中国政府网,2023年10月18日,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09882.htm?os=win&ref=app。

支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 20 多个国际组织，在 60 多个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了 190 多个项目，受益人数超过 3000 万。^[1]在互联互通工程建设中，中国提出了“政府贷款+本地运营”的合作模式，强调优先雇佣当地劳工、积极推动本土企业参与。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5 年 2 月，中国企业在非洲累计参与新建和改造了近 10 万公里公路、超 1 万公里铁路、近千座桥梁、近百个港口；在非洲实施的粮食、供水、教育等民生项目惠及广大非洲人民，其中，仅肯尼亚蒙内铁路一个项目就直接和间接创造了 7.4 万个就业岗位。^[2]

中国还从自身经验出发，重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共享科技成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现代产业。2023 年 11 月，在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上，中国首次提出《国际科技合作倡议》，倡导并践行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合作理念，坚持“科学无国界、惠及全人类”，携手构建全球科技共同体。^[3]截至 2025 年 6 月，中国已与 80 多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与有关共建国家启动建设 70 多家联合实验室；面向共建国家建立了 10 个国际技术转移中心。^[4]中国与沙特合作，投资 1.5 亿美元建成了首个中东数据中心，并深化中阿卫星导航合作，为阿拉伯国家的民生应用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5]；与拉共体国家通过共享地球资源卫星数据，为当地农林监测、灾害预警、环境保护服务，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与越南、泰国、

[1]《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举行 2025 年季度例行记者会（全文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2025 年 10 月 15 日，<http://www.cidca.gov.cn/20251015/7231ee4a483d4f3187404bd247e431e1/c.html>。

[2] 参见《共赢共荣！项目合作带动全球南方发展》，载《经济参考报》2025 年 3 月 19 日，第 1 版；《友谊、繁荣、生态之路——肯尼亚蒙内铁路的八年共赢答卷》，新华网，2025 年 6 月 11 日，<http://www.xinhuanet.com/silkroad/20250613/24ad272af2374f859da3f1381d9c54b5/c.html>。

[3]《国际科技合作倡议》，科技部网站，2023 年 11 月 7 日，https://www.most.gov.cn/kjbzg/202311/t20231107_188728.html。

[4] 和音：《携手构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25 年 6 月 15 日，第 2 版。

[5]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 2025/2026》，北京：时事出版社 2026 年版，第 276 页。

菲律宾开展的光伏电站项目，解决了当地人民的能源短缺问题，并带动绿色产业链发展。同时，中国通过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国际疫苗创新与研发合作联盟、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中国—太平洋岛国农业合作示范中心等，与全球南方国家及国际组织分享各自在优势领域的发展成果，共同应对粮食安全、减贫、能源安全、产供应链紊乱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能力。

另一方面，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习近平主席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支持各方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行动。在联合国框架下，中国广泛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协助发生冲突的国家和地区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截至2025年3月，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参与联合国25项维和行动。^[1]2022年以来，中国推动乌克兰危机、加沙冲突、泰柬冲突政治解决，并向乌克兰、加沙、泰国和柬埔寨提供多批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缓解冲突地区的民生困境和战后重建问题，为实现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2023年8月，中国与泰国、缅甸、老挝开展联合行动，打击电信诈骗、人口贩运、绑架、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确保相关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还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的理念，深化产供应链国际合作，在发展新能源、和平利用核能、民用无人机出口管制等领域实现互利共赢，保障各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五）注重行动导向，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作用

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并非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坚持知行合一，与世界各国重振多边合作主义，对现行治理体系进行改革与完善，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推动大国展现责任担当。大国拥有更强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有责任也有义务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致力于推动建立新型大国

[1]《为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载《解放军报》2025年3月30日，第4版。

关系，积极推动大国在维护多边机制、支持全球南方国家能力建设、促进发展知识共享等方面多发挥引领和建设性作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推进，双方“积极开展共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和配合，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一贯坚持对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高度负责的历史观、人民观和全球观处理中美关系，并强调中美两国可以共同展现大国担当，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1]，双方在打击非法移民和电信诈骗、反洗钱、人工智能、应对传染病等领域合作前景良好。中国与欧盟作为世界两大重要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欧盟有意愿与中国“共同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2]2024年5月，中国与巴西共同发布《中国、巴西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共识》，呼吁有关各方遵守“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并发起“和平之友”小组，获得110个国家的积极回应。

二是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变革作用。过去40年，“全球南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全球占比从24%增加到40%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3]“全球南方”崛起有利于打破以西方国家为主的“中心—边缘”结构，深刻变革世界政治、经济和文明版图。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持续深化其团结合作，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1]《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釜山举行会晤》，外交部网站，2025年10月30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xjpfhgxcxytjhzzdssecldrfzshybdhgjxgsfw/zxxx_145604/202510/t20251030_11743847.shtml。

[2]《习近平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新华网，2025年7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50724/bd27750b9a174f719a67d799cbd0ac6c/c.html>。

[3]谢春涛：《为“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载《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6日，第9版。

峰论坛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1]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宣布实施“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并与部分亚洲、非洲国家签订了“全球安全倡议合作谅解备忘录”，计划提供约1700个名额，培训各类安全治理人才。2025年3月，中国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计划未来5年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1000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名额和10万个研究培训名额。正如坦桑尼亚—中国友好促进会秘书长约瑟夫·卡哈马（Joseph Kahama）所指出的，“中国让许多过去不被国际社会听到的声音现在变得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充满信任”。^[2]

三是借助非国家行为体的专业力量。进入新时代，中国更加重视推动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其一，中国与非国家行为体在环境、气候、海洋、数字治理、人道援助等领域建立了多层次、多主体的合作机制，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例如，中国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CC）作为非政府机构，积极开展网络安全国际合作，截至2025年，已与87个国家和地区的294个组织建立了“CNCERT/CC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构建起跨境网络安全事件的快速响应和协调处置机制。^[3]又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加大援外医疗服务等方式，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向非洲、南太平洋岛国和加勒比海地区新增派了医疗队，年均服务受援国患者达数百万人次并逐年增加；中国援外医疗队已与43个国家的48家医院建立对口合作关系，共建26个临床重点专科中心，为受援国引入数百项新技术。^[4]其二，以企业为载体推动经济合作项目落地。鼓励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双向奔赴”，相互投资创业，优化资源配置，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

[1] 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讲话》，新华网，2023年10月18日，http://www.scio.gov.cn/ttbd/xjp/202310/t20231018_775029.html。

[2] 和音：《构筑共同安全 建设持久和平》，载《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日，第2版。

[3] 参见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简介，<https://www.cert.org.cn/publish/main/34/index.html>。

[4]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彰显中国担当》，国家卫健委网站，2025年5月14日，<https://www.nhc.gov.cn/xcs/c100122/202505/35191b938c454f6c83e11e686525089c.shtml>。

年均解决了 200 多万个就业岗位，出资建设了一大批教育、卫生、环保和民生设施，赢得了东道国各界的广泛赞誉。^[1]其三，以高校、智库、社会组织为载体，加强全球治理知识和经验的交流学习。中国通过“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鲁班工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等平台机制，举办“全球南方”智库对话会、青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青年全球治理创新设计大赛等活动，鼓励高校、智库、非政府组织加强沟通合作，培养参与全球治理的各领域人才，推动全球治理架构更为均衡有效。

结 语

全球治理倡议是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严重失衡的背景下，中国为进一步应对全球性挑战、破解全球治理难题而提出的系统性治理方案。全球治理倡议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系统性继承和创新性升华，也是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形势的战略回应。作为对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深化与拓展，全球治理倡议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原则、方法和路径，进一步丰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内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范式，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时代担当与文明自信。总之，全球治理倡议为变革中的全球治理体系注入了新的动力，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为全人类共同应对挑战、开创美好未来描绘了一幅富有建设性的蓝图，其价值将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实践中得到检验。

【 来稿日期：2025-12-25 】

【 修回日期：2026-02-09 】

（责任编辑：马燕冰）

[1] 《202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 7.1%》，新华网，2026 年 1 月 22 日，https://www.gov.cn/lianbo/202601/content_7055840.htm。